

学术的自觉与学
者的自立

当代学者研究

余英时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
当代学者研究

余三定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武汉

K820.57
88

学术的自觉与学
者的自立

当代学者研究

124725

余三定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余三定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5.

ISBN 7-5622-1889-7/G·907

I. 学…

II. 余…

III. 人文科学—科学工作者—研究

IV. G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2141 号

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

当代学者研究

◎ 余三定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石首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李显杰·陈昌恒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朱平珍

督 印:方汉江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字数:225千字

版次: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定价:1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对于研究者的研究

(序 言)

王富仁

本书原拟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叶朗教授作序,但因叶朗教授出国讲学,余三定先生临时把书稿寄给了我,时间紧迫,已不容我推辞,只好勉为其难,承担起这个我原本没有能力承担的工作。

我认识余三定先生已有好几年了,并且知道他一直坚持着这样一个繁重的工作,即研究着当前学术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对他的工作,我是很重视的,也是很感佩服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像余三定先生这样在这块处女地上辛勤耕耘的人还是不多见的。

中国的学术文化同整个中国的文化一样,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性质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严格说来,我们现在的学术文化,不论是研究孔子的还是研究鲁迅的,不论是研究屈原的还是研究荷马的,都已经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部分。我认为,较之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中国现代的学术文化有下列几个显著的特点:一、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社会性空前加强了。它首先是中国现代教育

的产物,是以中国现代的高等学校为主要基地的,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项事业,这个事业是与其它的各项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从社会各个阶层中接受学生,这些学生也把社会各个阶层的思想愿望、文化习俗带进了现代的高等教育,而他们接受教育之后并不都是留在高等教育机关,留在学术文化的内部,而是分发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各项事业中去,社会的要求同时也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基本要求。可以说,现代中国社会上有多少项社会事业,现代中国高等学校里就有多少个系科,同时中国学术文化中就有多少个部门。它与社会上的各项社会事业是相互联系着的,这是它的外部联系;它的各个学术部门也是互相联系着的,这是它的内部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学术部门的变动有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个社会和社会文化的变动,而这,就是它的社会化程度提高的表现。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中是不具备的。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主要活动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官僚知识分子内部,它的影响主要是纵向传承的。一个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教给自己的学生,或者写成书,传给后代的学者,并且一代一代地传留下来,在积累中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但它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上的横向传播幅度是极小的,因为当时的社会除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官僚结构之外,是没有现代社会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的,而它与广大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绪的变迁又是没有直接的连带关系的。总之,社会性的加强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一大特征。这种特征,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文化中已经明显地加强起来,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仍然主要停留在官僚知识分子的内部,停留在学术与政治的极为单纯的关系中。康有为、梁启超的学术文化是他们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是宣传论证他们的政治改良主张的,但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情况就不同了。这个运动,严格说来,只是一个学者的运动,教授的运动,它是在大学校园里酝酿成功的。

陈独秀、胡适、鲁迅这帮子人，既不是什么贵族官僚，也不是与社会无涉的隐士高人，和我们现在这些搞学问的人在身份上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的学术文化从官僚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解放出来，把它从学术与政治的简单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了一项真正的社会事业，并且把它建立在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上，成了我们这些既非官僚、也非隐士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专门事业，它独立地面对整个社会，它的社会性空前地加强了。二、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国际性空前加强了。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文化，开始与外国文化发生多方面的接触和碰撞，接触和碰撞的结果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现代文化。“五四”以后，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既有对立又有融合的关系了。这表现在学术文化上，首先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对象已经不限于中国的文化，而是扩大到了整个人类文化的范围，尔后不但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中国文化的内部，甚至连每一个研究者的文化知识基础也不再仅仅是中国固有的。直至今日，中国的学者所从事的具体研究是有各种各样的差别的，是有中外古今的不同的，但赖以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基础却莫不是国际性的。在我们的大学里，不但有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有外国文学，不但有中国古代哲学、中国现当代哲学，也有外国哲学，一个研究杜甫的学者，所读过的绝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的诗歌，同时也读过像拜伦、雪莱、普希金、海涅这类外国人的诗歌；一个研究卡夫卡的学者，所读过的绝不仅仅是外国的小说，同时也读过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阿Q正传》这类的中国小说，整个人类的文化在我们研究者的头脑里组成了一个新的有机的整体，你想把他们像切西瓜一样截然地分为两半已经根本不可能了。与此同时，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也国际化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国际交流日复一日地加强着，外国人也在研究我们的老子、孔子和鲁迅，我们也在研究他们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莎士

比亚。互相影响,互相启发,当然也有互相的辩驳和攻击。但不论怎样,它不再是封闭在民族内部的学术文化,而是开放着的,与他民族的学术文化紧密联系着的;像过去那样一刀就能切开中与外、古与今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三、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科学性空前地加强了。人类的文化,不仅仅是科学的;人类的思维方式,也不仅仅是科学的,所以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所研究的对象,并不局限于科学的成果。但学术文化却是一项科学的事业,它依靠的是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并担当着社会理性思想之间的交流任务,它的自身不能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又被称之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五四”新文化的口号中,明标着的就是“科学”、“民主”四个大字,此后不久,又发生过一次学术界的科玄大论战。这都说明,科学意识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成了人们无法忽视的一个问题。与此相联系,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成了现代学术文化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按照我的理解,科学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学术文化的一种学术规范和操作方式,是实现认识目的的有效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也是不同社会成员间进行思想交流的有效传播方式。一首诗骂不倒孔子,一幅漫画否定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49年以后搞了那么多政治批判运动却没有解决任何一个固有的理论问题和社会思想问题,就是因为学术文化从事的是科学研究,只有用科学的方式、理性的态度,才能实际地实现它所应当实现的目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学术文化的上述三个基本特点,与中国学术文化繁荣发展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反映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身的需要和与之有直接联系的国家政权的需要,那么,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反映的则是整个社会的需要了。它自觉地担当起了社会各个阶层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和认识人类自己的各种不同的任务,它的系科也就在这些不同的社会要求中不断丰富、不断完善起来。外国文化的影响在

启发我们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和认识人类自己的过程中无疑也是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的。外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组织方式、外国学术文化的系科分类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系统的建立和迅速完善，而它的科学性则极大地保证了它工作的有效性和社会传播渠道的畅通性。依我的意见，到了20年代初，中国学术文化的整体格局就已经初步形成，它是通过自身的分化完成的。正像一棵大树，初初冒出来的是一个主干，然后分了枝，枝又分枝，枝上又生了叶，才有了风采，有了生机，有了自己的完整性。粗略说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年代末，中国的文化发生了下列几次大的分化：一、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分化。这个分化同时也是学术文化的分化，自这时起，几乎在各个大的学术文化领域里，都有了“新学”与“旧学”的区分，它不是实际地消灭了旧学，而是通过新学的产生把新学和旧学同时组织在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系统里。正像夫妻两个生了个孩子，这个家庭就有了两辈人，这个家庭同以前的家庭不一样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和“旧”只是当时人的感受和说法，时至今日，新的也不那么新了，旧的也不那么旧了。“儒学”当时是旧学，但“新儒学”就不那么旧了，只要我们翻开新儒学家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在新儒学家的著作里像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柏格森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的名字所出现的频率，是不亚于任何一种其它的著作的。它社会化了、国际化了，论述的方式朝着科学性的方向发展了。“新儒家”的大多数著作都是用现代白话文写的，而白话文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基本语言载体的。如何理解当时新学与旧学的分化和联系，我们最好通过蔡元培这个人物来理解。在当时，他体现的是“干”，而新学、旧学则是在这个干上生出的两个大枝，不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刘师培、黄侃；不论是胡适、钱玄同还是辜鸿铭、梁漱溟，都是从蔡元培这个现代高等教育的总干上分化出来的，他把他们连成了一个中国学术文化的整体。二、学院派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分化。

我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作是现代政治文化与学院派文化开始分化的标志。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都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彼此各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作为中国现代社会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发展起来，并从学院派文化中分化了出去，开始与现代的政治革命和政治权力相结合，胡适则继续留在学院派文化的内部，并在这里逐渐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上去。这个分化，不但使中国产生了马列主义文化学派，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整体结构。陈独秀、李大钊体现的马列主义文化在社会政治的领域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文化构成了中国现代两种主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并且与现实政治制度相结合，成了体现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在中国古代，儒学是作为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受到社会的重视的，历代的皇帝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意识形态，他们就把儒家文化改造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到了这时，政治集团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就成了一个文化弃儿，不论政治集团对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传统抱有怎样的好感，它也不会像保卫自己的意识形态那样毫无保留地保卫儒家文化传统了。这对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传统难说不是—种拯救的方式。正像一个久被众家丁呵护而常常欺侮其他同龄儿童的富家子弟突然被孤零零地抛到了这些同伴中、开始受到同伴们的集体围攻、不得不自己设法保卫自己并因而变得聪明起来和强壮起来—样，儒家文化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经历了自己的风风雨雨，非常艰难地生活了下来，并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系统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它的独尊地位到底已经丧失了，这不但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产生的新的学术文化部门存在并发展起来，而且使在中国古代受到它的直接或间接压抑的道家文化传统、法家文化传统、墨家文化传统、道教文化传统、佛教文化传统重新以平等的地位进入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系统。尽管直至现在新儒家学派的

代表人物仍然把中国传统文化仅仅理解为儒家文化，但这已经只是他们的一个美好的回忆，一个温暖的梦幻，它不但不被各种新的文化学科所承认，同时也遇到了中国古代各兄弟学科的反抗。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仅仅包括儒家文化传统，同时也包括上述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甚至也包括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崇高地位、只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受到了重视的中国古代小说、戏剧这样的古代文化遗产。也就是说，连中国传统文化整个基本的概念也在文化的变迁中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在我们现在提倡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京剧、地方戏、武术、气功成了重点弘扬的一些对象，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它们则是被正统的儒家文化所不齿的。在过去，我们把围绕“问题与主义”展开的这场论争只看作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但若从它的实际发生根源上，我们就会看到，它们反映的恰恰是政治文化和学院派文化的不同要求。政治文化是对社会结构的整体改造和调整，它需要一种统一的模式、统一的原则，因而它也需要一种统一的“主义”。李大钊强调“主义”的重要性恰恰因为他着眼于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改造，着眼于政治的文化，而到了学院派学术文化的内部，我们就会感到，仅仅“主义”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数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解决不了医学中的癌症的治疗问题；孔子的研究代替不了鲁迅的研究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它们彼此联系着，但又必须分别解决。这里重要的是“问题”，而不是“主义”，“主义”也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存在的。所以，这个论争在整体上区分了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和学院派学术文化的不同并且划分开了两个文化领域。直到现在，在政治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在学院派文化对各不同学科中的各类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是区分政治文化和学院派文化的一个基本标志。三、学院派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分化。在“五四”时期，胡适和鲁迅是同属于“新文化”这个枝干的，到了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两个人的分歧开始明显化了，此后两个人就走上了两

条不同的文化道路。在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整理国故”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胡适为什么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而鲁迅为什么反对它的问题。显而易见,胡适是在大学里当教授的,他面对的是正在读书的学生。在学院派的内部,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书本,文化研究就是研究各种各样的书本。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更是如此。在当时像胡适这样的归国留学生,是学了外国的书本的,但中国也有许多的书本子,我们还没有像外国人那样整理研究过它们,对于有了新的思想和方法的现代青年知识分子而言,整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留下来的书本子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发挥他们智慧和才能的广阔的文化空间。但是,到了鲁迅这里,情况就不同了。在“五四”同人之中,鲁迅是唯一一个不是北京大学教授出身的人。他为什么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他想到北京大学来当教授,当学者,而是他在自己的社会经历中感到了苦闷,感到了中国社会的沉滞和落后,感到了中国社会思想的传统应当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应当改造。这种国民性不仅仅是书本子上写的,更主要是在现实社会当中表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希望觉醒起来的青年再一头扎进中国古代的书本子里去,而是用自己的知识和文化思考现实的矛盾,解决现实的问题。这二者当然不是截然分开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又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的根本分界在于知识分子应当重视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是研究在中外文化典籍中提出的“问题”呢?还是研究中国现实社会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呢?它区分了两个文化领域。直至现在,学院派文化还是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书本子的。屈原的诗歌艺术、司马迁的历史观念、曹雪芹的家世、尼采的美学思想,这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从中外文化典籍中生发出来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大量在现实生活中直接面对的问题,例如当前文学创作中的思想艺术倾向、当前社会各阶层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情绪、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向等等问题,对这些问题,活跃在社会各个部门的编辑、记者、文艺评论家、专业作家、艺

术家、律师、工程师、经济师等等，是比学院派文人更加熟悉和关切的。在当时，以鲁迅体现的社会文化开始从学院派文化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学院派文化与一般社会文化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更复杂的文化格局。我认为，中国现代的学术文化通过这三次大的分化，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文化系统。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学院派文化成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三个大的子系统，而在各个子系统内部又有偏重于发掘中国固有文化的潜力和偏重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果两种倾向，并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系科，它们彼此渗透，但又彼此独立，决定着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是在不断的分化中实现自己的繁荣发展的，同时它也因这分化而埋藏着自己的危机。我们上面把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比喻为一棵大树，但这个比喻并不是完全贴切的。因为树的每一个部分是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的，它意识不到自己与整体的差别，也没有彼此之间的相互斗争，而学术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由具有独立性的人组成的，他们如何意识自己与其它部分的联系与区别是有关键性的意义的。一般说来，在一个学术文化系统由于向枝发生分化的时候，特别是新生系统的成员，还是同时具有两种明确的意识的，其一是整体意识，其二是独立意识。不论他们受到旧传统何等严重的压迫，他们也不会把为争取自己独立性所做的斗争作为独霸中国文化的手段，这是一个文化意识问题，而不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他们是在旧文化中孕育而成的，因而在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的时候也不会从根本上否认旧文化传统在社会上存在的根据，文化总是由新旧两个面组成的，它是一个演变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代替一个的过程。我们说蔡元培就体现着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主干。而在他这里，中国现代的学术文化是完全统一的，不论是新学、旧学、中学、西学，在他那里都是“学”，它们之间有斗争，但这种斗争却是促进彼此发展的手段，而不是一个

简单地消灭一个的方式。陈独秀和李大钊、胡适、鲁迅所体现的三种文化倾向彼此是独立的，因而也有相互的斗争，但与此同时，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相互的理解，他们始终在“五四”这个新文化的总根子上紧密地联系着。但到了中国学术文化的第四次大分化，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就开始埋伏下了自己的危机，这种分化同时意味着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分裂倾向。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第四次大分化是中年文化与青年文化的分化。1919年以后，特别是在1921年以后，一批现代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到了中国现代文化界。他们是在“五四”新文化系统基本建立之后进入中国文化界的，他们的历史作用是充实了中国现代的文化系统，并以自己的青春热情给中国现代文化注入了活泼的生机。但他们不同于“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们，他们不是从中国文化的总干上发展起来而后才各自分离、走上不同文化道路的，他们一开始就加入到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旁枝上，当他们用青春的热情和知识分子的自尊把自己的一枝夸张性地视为唯一正确的文化方向的时候，就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绝对排斥其它文化倾向的道路。我们必须看到，鲁迅对胡适的态度是不同于郭沫若对胡适的态度的，与此同时，梁实秋对鲁迅的态度也根本不同于胡适对鲁迅的态度，而在同一个文化子系统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否定趋势都相应地加强了。鲁迅对胡适白话文主张的捍卫和白话诗创作的评价远远超过徐志摩、梁实秋这些胡适的新月派同人，而胡适对鲁迅小说的感受则远比郭沫若、成仿吾这些鲁迅的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来得深刻和具体。由此可以看出，在这里起作用的并不仅仅是个人与个人间的情意关系，而是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观念。文化和学术再一次主要作为个人才能和道德的表现而被理解着，这在不同的文化倾向和学术倾向间就埋伏下了绝对排斥的种子。这种排斥由于后来政治文化的分裂而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文化的第五次大分化就是从20年代末期开始至30年代初期完成的左翼文化与右翼文化的分化。这个分

化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分裂引起的，它同时也导致了整个中国文化、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分裂。按其本来的意义，学术文化是不同于政治的，在一个民族里，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里，是不可能同时实行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的，所以在1927年国共合作推翻了旧的军阀政府之后，国共两党就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国民党政府用武力镇压的手段非法驱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一党专政的政治统治。但在学术文化上，原本是可以不如此的。学术文化是一种和平的交流手段，社会主义学说、无政府主义学说、国家主义学说、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佛学、儒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这些五花八门的思想学说不但可以同时存在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内部，而且恰恰是在彼此的竞争中才能不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学术文化的本身只有思想的征服力，而没有实际的杀伤力，它正像若干足球队的联赛，是不以对方的灭亡为前提的。但这时中国学术文化中的分化却因政治文化的分裂而走向了分裂，右翼文化不承认左翼文化存在的合法权利，除少部分同情和支持左翼文化人士的民主主义者之外，多数右翼知识分子对左翼知识分子受到的压迫和迫害抱着冷眼旁观乃至幸灾乐祸的态度，致使左翼知识分子在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反对右翼文人的诬蔑和攻击，增强了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原本存在的对右翼文化的绝对排斥态度，并把他们当作国民党政治统治的附庸进行排斥。中国学术文化正式分裂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它不是以学术观点的区别和联系意识彼此的关系的，而是以政治态度的区别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甚至在一个文化派别的内部，由于把政治标准广泛地运用于学术研究，其分化也具有了彻底分裂的潜能。1949年以后中国学术文化的悲剧性分裂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分裂了的文化追求自己的统一性，但这种分裂却不是由于学术文化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所以在中国文化重新走

向统一的过程中就采取了政治兼并的方式。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胜利,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胜利,但在文化分裂了的中国,它又被视为左翼文化对右翼文化斗争的胜利。这样,以胡适体现着的学院派文化就被整个地当作资产阶级文化而受到了根本的否定,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继之而来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由于采取了政治批判的形式而模糊了其中学术文化的性质,不论当时的动机如何,它实际成了马列主义政治文化对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的大兼并,从此所有学院派文化应当实际解决的学术“问题”,都被纳入到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主义”的分歧当中来看待,来处理,这些“问题”也就不好解决了。马寅初的“人口论”并不属于马列主义,但它提出了现代中国社会不能不注意解决的问题。在“主义”的旗帜下人们不再愿意切实地理解它的意义和作用。所以,“问题”和“主义”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大兼并是围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展开的。胡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属于社会文化派,他对胡适所代表的中国学院派文化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在马列主义文化阵营中继承了鲁迅的社会文化传统,重视的是文艺创作的特性,重视的是中国社会思想的改造,因而他的学术思想不是在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性质。从学术文化的角度讲来,这种不同是可以允许的,但由于政治标准自身就是绝对排斥性的,于是在中国左翼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胡风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它的实际意义是马列主义政治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大兼并。政治文化是不同于社会文化的,政治文化解决的是社会组织形式的问题,是各项政治措施赖以制定的总原则,而社会文化是面临社会现实存在的具体问题而提出的,是必须根据现实条件加以解决的。中国的国民性是在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具体地形成的,不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立即变化的因素,即使它与一种政治文化学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些联系也不是在当时立

即可以意识到的。所以，社会文化机制的被破坏，给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都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从此之后，即使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独立地面对现实社会，提出并研究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了。中国学术文化的生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个破坏到了反右派斗争之后达到了顶峰。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和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名存实亡，使社会的矛盾直接转移到了政治文化内部，转移到了执政党的内部，当这种排斥以“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形式在执政党的内部展开的时候，就有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标志着中国文化的暂时窒息，就是因为文化的矛盾采取了非文化的解决方式，文化这种社会交流手段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因而文化也就窒息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化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重新复苏的，在开始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复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开始独立地面对社会现实问题而从事自己的文化活动。其次是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复苏，鲁迅研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它理应起到的作用；再次是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的复苏，它不仅复活了像胡适这样的“新学”派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复活了像辜鸿铭、梁漱溟这样的“新儒家”学派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一时又呈现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景象。余三定先生把自己这部著作定名为《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我认为很好地抓住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学术文化发展的特征的，社会文化和学院派文化重新从政治文化中分离出来，成为与政治文化并立的三大文化子系统两个独立的文化系统，并用自己独立的操作方式进行实际的操作，不能不说正是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实现着一个目标。

新时期中国学术文化是在重新分化的过程中获得繁荣发展的，但在同时它也存在着一一种潜在的危险，即像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学术文化一样，在表面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再一次走向分裂，走向自